

王念孙
王引之
年谱

王章涛 著



扬州学派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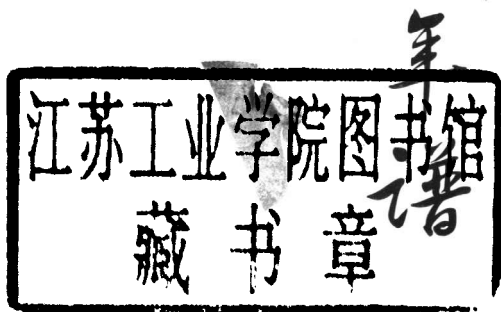
广陵书社

YangzhouXuepaiCongshu-ErWangNianPu

王念孙
王引之

王章涛 著

扬州学派丛书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念孙·王引之年谱 / 王章涛著. —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6

ISBN 7-80694-141-X

I. 王... II. 王... III. ①王念孙(1744~1832) — 年谱
②王引之(1766~1834) — 年谱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374 号

书 名 王念孙·王引之年谱

著 者 王章涛

责任编辑 邱数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qlpub.com> E-mail glss@yztoday.com

印 刷 金坛市新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印 数 1500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141-X/K·65

定 价 50.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如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塑像

序

赵昌智

清代乾嘉时期,朴学大兴,名家迭出。而高邮王氏父子的成就尤为卓著。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生于乾隆九年(1744),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十九。其父王安国,官至吏部尚书。念孙从小随父读书,曾师从当代大儒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由此打下一生治学的基础。乾隆四十年(1775)念孙中二甲七名进士,钦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四十六年,补行散馆考试,以一等第五名改工部主事。念孙多年任谏官。乾隆五十三年,补监察御史。五十八年,擢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转吏科掌印给事中。以劾罢巨贪和珅,直声震朝野。旋出为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不久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复调永定河道。嘉庆十五年(1810),因永定河水异涨复溢,念孙自请治罪,以六品致休,时年六十七。从此,日以著述为娱,直至终年。

王引之,是王念孙的长子,字伯申,号曼卿,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十九。嘉庆四年(1799),王引之经会试、殿试选拔,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大考一等擢侍讲。历官河南学政、通政司通政使、工部尚书等。引之一生治学,以父为师。少时问学,其父王念孙即曰:是可以传吾学矣。及长,父子讨论,互相证发。《经义述闻》可以说是王氏父子共同的著作。《清史稿》

说：“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王氏父子一生著作甚丰，而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最为著名。他们的学术成就也以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校勘学方面贡献最大。古经传多用同音假借字。有清一代，从顾炎武以来，倡导通过研究古音以求经之本义，可以说是汉学家的共识。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辟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广雅疏证序》）念孙敢于创新，他又说：“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字，见伐于康成者矣。”（《经义述闻序》）这大体上可以看出其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学方面的真知灼见。“王氏四种”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和方法支配下完成。

王氏父子学术成就多多，这里仅略举一二。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载有王念孙《与李方伯书》，阐述了主张古韵二十一部的理由，许多见解与同时其他学者段玉裁、江有诰等不谋而合，纯属个人独到创见的就是“析脂部去入之至霁质栉等韵为一部”，夏忻在《古韵表集说》、王力在《论古韵分部异同》中都称赞“王氏之见，诚为卓识”。先秦文字中有表示迟疑不决的“犹豫”一词，或作“犹预”，或作“犹与”、“容与”，古人有解释为犹是一种兽，豫也是一种兽，皆多疑，故用以描述人之多疑。其实这是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王氏明确指出“双声之字，本因声以求义”的道理，拨开了迷雾，给出了正确的解答。《战国策·赵策四》“左

师触耆愿见赵太后”，古人或云“触耆”确系人名，或云名为“触龙”，但下面多了一个“言”字。王念孙综合前后文、不同版本、同时代其他书例来分析考证，指出这是两字误合为一字的例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记载有这件事，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赵太后”，一段公案到此有了结论，证实了王念孙二百年前的考证严实缜密，功力深厚。还有，王氏父子特别是王引之对古文献中虚词的研究也为学人所称道。经籍多用虚字，而汉唐学者，往往以实义曲解，就失经文本意。王引之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中收集了160个虚词，举例说明其意义、用法、演变，体例完善，训释精当，“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经传释词·自序》）“学者执是书以求之，当不悖谬于经传矣。”（阮元《经传释词·序》）

王氏父子生前身后都赢得了人们的极高评价。王昶《春融集·四士说》：“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训导宝应刘台拱，有曾闵之孝；给事中王念孙及其子国子监生引之，有苍雅之学；暨君（指汪中）有扬马之才。时谓之‘四士三美’，宜矣！”汪中评曰“论次当代通儒仅八人，而王氏有二。”（汪喜孙所撰《年谱》）焦循《雕菴楼集·读书三十二赞》：“高邮王氏，郑许之亚。借张揖书，示人大路。”阮元称赞“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汪、焦、阮之词或有人讥之为“乡曲之私”，但力排汉学的桐城方东树的评价却不得不为人所叹服了：“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汉学商兑》）1983年高邮王氏纪念馆落成，众多专家学者撰文、书联推崇王氏父子。张舜徽撰书“发经传妙谊，为古训宗师”。李一氓：“父子一门乾嘉绝学，宋明以外训诂大成。”任半塘：“歛欬扬州，《禹贡》其畴，王氏乔梓，笃学秦邮。孔毛并辔，郑许同舟。校勘训诂，足式千秋。”应该说这都是名至实归的。

当然,不是说王氏父子的学问已无懈可击。因为任何人总不能脱离客观条件,总不能超越时代,局限总是难免的。但有一种观点则不敢苟同,认为乾嘉学者见字不见思,为考证而考证,只谈学问不谈思想,只见文字不见政治。我认为这种观念偏激了。王念孙的“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就是王氏父子实际上也是有清一代训诂学的宗旨。见字不一定直接见思,但见字就是为了见思。即使是一些纯学术性问题的研究,一些治学方法的探索,对学术的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乾嘉以后中国学术事业不断繁荣发达,就因为有一批专门从事学术事业的人。更何况乾嘉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只知训诂不懂“经济”的人。譬如高邮王氏父子。

也许因为王氏父子学术成就太大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他们经世致用的业绩。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王念孙把握契机,奏本参劾大学士和珅。在奏状结尾处,根据王引之的建议加上“唐尧在位,犹有共驩,虞舜登庸,即行诛殛”。将乾隆比作尧,嘉庆比作舜,而把和珅比作唐尧时的奸臣共工、驩兜,惩办和珅,既无损乾隆威望,又显示嘉庆的英明。所以《清史稿》赞其“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念孙在《敬陈剿贼事宜折》等奏章中,献“除内贼”、“择经略”、“扼险要”、“广召问”、“明赏罚”、“抚良民”六策,提出“天下之患莫甚于壅蔽,人臣之罪莫大于诈欺”,指责墨吏“怀饰非护过之心,无忧国奉公之意”。在巡视淮安、济宁漕务任上裁汰陋规、严肃吏治,在永定河道任上殚精竭虑,勤勉治水。由王念孙从政行事中可见其思想、抱负、才干,而绝非食古不化、庸碌无为者。王引之出任山东学政,嘉庆帝谕令“以实心整饬士习”,并密查山东省大吏劣迹及相关吏治情况,引之查实具奏,帝以此知“忠实可大任”。针对奸人倡为邪说、蒙蔽百姓、骗取钱财的情况,著《阐训化愚论》、《见利思害说》进呈御览,得以

颁行化导。特别是引之以钦差赴福建，平反布政使李庚芸冤案，奏请革职查办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大员，再造吏治清明，震惊朝野。对农村蝗灾、里下河水灾，虽非其职内之事、管辖之地也十分关心。这是经世致用之大端。

其实，依愚见，遵循儒家传统，恪守古训，修身、齐家也是通经致用的重要表现。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记住中式后朱轼对他讲的一句话：“学人通籍后，惟留的本来面目为难。”终生以为训诫。为官清廉，官至尚书“衣食器用，不改于旧”；中年丧偶，不续弦、不纳妾；公事之余，惟潜心学问。这也成了念孙父子的楷模，成了高邮王氏的家风。王念孙未蓄妾媵，六十岁妻子病故，以后几十年块然独居。他在永定河道任上因暴雨成灾，不但免官，而且拉下两万七千两白银的债务，父债子还，引之代缴，十五年完至二万余两，直到道光新元，才恩诏豁免余款。其父子之清廉于此可见一斑。再就是治学刻苦，一丝不苟，《清史稿》载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念孙七十七岁时，手足偏枯，足不能出户，但伏理旧业不辍。这种精神在今天也还不失其借鉴作用。

近十几年，我从扬州大学祁龙威教授等前辈游，受他们影响，对乾嘉扬州学派也稍有涉猎，于高邮王氏父子颇多高山仰止之感，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想法。今见王章涛先生新著《王念孙·王引之年谱》，书中罗列之谱例及相互论证皆能证实上述不诬。恰王先生征序于我，盛意难却，勉为其难，故不揣浅陋，把这些想法写出来，以求教于大家。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特殊史传。虽是“一人之史”，但由于谱主经历的时代及因他而起的事件，加之其或宦游四方，政事突出；或精研学问，著述丰赡；或师友交往密切，见学坛之活跃；或家族繁衍兴盛，知一地之风情，因而使年谱具有了特殊的史料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中指出：“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故作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须翻书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如何，盖兹事若斯之难也。”但偏有不畏难者，王章涛先生二十余年痴迷于扬州学派的研究，已连续出版《阮元传》、《阮元评传》、《阮元年谱》等著作，现在《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又将付梓。他本人并非供职于机关、高校或科研机构，收集资料等均是自费，先前只有下岗补助，现在才拿到退休工资；当今学术著作出版之难众所周知，其出书之难可以想见。清代扬州学人颇多困厄者，如汪中，如焦循，如江藩，如宝应刘氏，“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这就是扬州学人的风骨。王章涛先生克绍箕裘，薪火相传，正是以乾嘉学派之精神治乾嘉学派之学术。所以，我更感到有责任支持王章涛，推介王章涛。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品砚斋

序

李 开

王章涛先生继鸿篇巨制《阮元年谱》(2003)和《阮元评传》(2004)之后,又著《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看来,章涛先生的旨趣,在于弘扬扬州学派文化,这不啻是乡土文化,民族文化,而且是世界级学人的,为人类文化、国际学术文化之一隅。今读高邮二王年谱,或由于专业的关系,自然心契,为之激动不已,中华传统文化之高贵无比和深切著明,引人折腰,诱人研翫。

年谱之学,由来已久。司马迁著《史记·三代世表》,取久有之书《五帝繫谱》,并“《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而著《十二诸侯年表》,则读到《春秋历谱牒》,并有感于“儒家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订历者受神仙家的影响,“隆于神运”,惟有谱牒能“独记世溢,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当“为成学治古文者”之所必备,“于是谱《十二诸侯》”。世表、年表及司马迁之前谱牒书,皆今年谱之滥觞,可见体裁之悠远。但学界一般把年谱之始归于宋代,其学科归属为历史科学,故与儒、道义理之说大不一样。既为历史,其认识作用当为知主体之人,论主客体相结合之世;其学术价值可为正史、国史之补。有如戴震在乾隆二十七年著《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后为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永》和《清史稿·江永传》所采。如此看来,年谱应是严谨而科学

的谱主史料学。《章学诚遗书·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刘氏嘉业堂刊本)称:“年谱之体,昉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以取证焉,不可不慎也。”章氏的意思是说,年谱价值之大,可附文集,乃至史书之后而并行之。如段玉裁《戴震年谱》附《戴震集》后,为研戴之不可少。然如今年谱亦多恢宏巨制,单独梓行,实为必然,但其作用仍与文集共为史论专说而不变,且因年谱的具体叙事特色,比文集更具在场性(in the presence of things themselves),更有史实的说服力。

中国人擅长修史,外国人倚重哲思。年谱既为史志,修撰必夥。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著录年谱 3015 种,记载谱主 1829 人,从传说中的虞舜迄于当代。后又有《总录》之《续录》,可谓盛矣!今人黄秀文主编的《中国年谱辞典》(1997,百家出版社)收录先秦至当代的年谱 4115 种,涉及历代人物 2431 人,为时下查检年谱的常用工具书。与中国的谱牒相近,外国则有谱系,或称谱系学(genealogy),它是对于起源和祖系血统的研究,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1887)中将谱系学定义为对于道德偏见的研究。后来法国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福柯.M 接过这一术语,将它发展成一个历史和学科的概念,不是寻找前后相续中的必然性因果关系,不涉及抽象的甚至是先验的主体,而是时间的回溯,寻找区别,经知识考古,凭一些时间性、地域性的不连续知识去揭示一个个事件背后的多重因素和脆弱的历史构型。很显然,福柯.M 的历史学范畴的谱系学与我国的谱牒学庶几可比了。近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谱牒学,或福柯.M 式的、打上知识考古烙印的谱系学,成了一种研究方法;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语言史等的探讨,都越来越重视谱牒的搜集和探讨,越来越重视用谱牒编纂法

研覈之,以求切实可靠,更符合经验事实的本真。

王章涛先生《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的著述,似乎与中外文化史研究中重视谱牒法相悬契。为二王牖述年谱,固是也;反过来看,用谱牒法研究二王,亦更是也。从“固是牖述”看,全书体例颇纯,可分析出四个层次。以“1766,王念孙二十三岁,王引之一岁”和1767年为例:第一层“某年要述”条。第二层“年时令月日”目,1767年条据实情并资料所得分“春、夏、是年概述”,1766年条分“二月十七日、三月十一日、三月初九日前、七月、是年概述”。第三层“据事系植相关文献”,1766年条“三月十一日”目系植文献三种,“三月初九日前”目系植文献二种。1767年条“春,王念孙登高邮文游台,赋怀古诗五古十二韵,缅怀秦观”目系植《丁亥诗钞·王念孙〈文游台怀古〉诗》一种。第四层“二、三层后章涛按”,此层往往长篇大言,必欲尽意而后快。以上仅就大例而言,系植文献的分层,随文作注之层,尚未计入。有云:文例亦为逻辑本身。章涛著文例体制,乃全书归纳逻辑,亦为切入章涛著须先明之要则,以防接读眼花之类。从“更是研究”看,全书考论切正,原原本本,史脉清晰,史识迭出,确有借谱牒编纂法研究高邮二王之实,故为研究高邮二王之必备,虽不能因过于厚重而如章学诚主张“附文集后”,但确为后来研二王者的案头常典。今略举数例,以见“更是研究”之功。如1761年按语备录“念孙自兹时始更致力于学术研究,专精而通博”,实为概述念孙一生涉及的学术领域和评价其成就,“尤精于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推而至于天文、算术之条贯,地理、山川之脉络,靡不兼综研核,溯流穷源”,在研究方法上“知郑、许者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以达“心知其意”,弋获“破之论”。又如记王念孙治永定河始末,1800年正月抵任除宿弊,1801年春夏间提出治水方案和阐发工程见解,六月决口失防,戴罪立功,1802年9月署永定河道,1803年4月上《论直隶河

渠言》，10月奉旨筹备新漕等。是为王念孙学术而外的另类实业景观。其他如始分古韵二十一部(1766年7月)，纪晓岚怀念戴震赋七绝二首示念孙(1793年9、10月间)，段玉裁因老病体衰欲请念孙续完《说文注》(1800年春夏间)，钱大昕谢寄赠《广雅疏证》且评鹭之(1802年)，龚自珍京师拜谒王念孙，感叹段外祖门祚不振(1819年)，经胡培翬转致江有诰论古韵函(1821年10月)，等等，可资逸闻研助。读年谱，因知高邮二王全貌：躬奉经国济世以至卓犖大美，身践公暇治学而流千秋英声。

我和章涛先生素昧平生，仅以文字之交而知其为嗜古之士，文笔古朴，学风谨正，或可谓其本人即“扬州学派”之一员。然细绎全书，亦有不逮，如史料纂集厚重，有分量的点评尚少，引二王本人对相关学理，如对清代学术之鼎盛古音学的精粹撮评尚少。有些系年，尚可商榷，如王念孙名著《广雅疏证》始稿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成稿于乾隆六十年(1795)岁末。今始稿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而于1787年无闻。又今人纪念活动部分，实为蛇足。

是忝为序。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六日

于南京河西龙园北路80号寓庐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凡 例

一、全书主要部分是《王念孙·王引之年谱》，附《王念孙·王引之著述知见录》、《王念孙·王引之传记资料目录》、《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相关人物名录等内容。

二、年谱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活动及相关事实为经，以其亲朋师生及与王氏父子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为纬，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史实；以记王氏父子本事为主，兼记与之相关人物的情况。

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同一时间的事迹，先父后子；个人同一时间的事迹，首述政绩，次记学术、著述活动，再次为行踪与交游诸项。

四、年谱文字力求简明扼要。辑录引文尽量从简，均标明出处，以备检索。

五、所记岁次，以清代纪年、干支和公历年次并列，月日皆采用夏历。欲知公历，可参阅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谱中不作换算。

六、凡有考证、补充、评述等项内容，皆以按语形式分别置诸条目之下。

七、全书采用规范简化字，凡异体字、错漏字亦加厘定。对于个别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用字，因简化可能会出现歧义，仍一律依旧。

八、谱中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有交往的人物，不以按语形式介绍，因其多数在谱中重复出现，若仅记于首见，前后检索不便，故于谱末附有《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相关人物名录备查。

九、谱中引文,凡反映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有关内容之文献,仅摘录与之相关的部分;凡王氏父子与他人他事有关的内容,亦仅作摘录;极少数情况,如系孤本、佚文、考古资料,经选择录其全文,以省研究者寻绎之劳。节录引文,如省略中间部分,其省略部分加省略号,如省略首尾,则不加标志。

十、凡引文有明确年月日者,皆照实存录;若无,经考证后采用。

十一、所引文献资料,在摘录或全录时,为保持原著面貌,未作任何改动。

十二、因某种需要,在引文中增加某些说明文字时,不赘“按”、“一作”、“改作”之类的字句,仅以方括号括入,以示与原著正文、按、注等字句相区别。

十三、引文资料出处,标志于引文末。该标志,先作者,次篇目,再次为书目,未置卷次,以阿拉伯数字标明,并用圆括号括入。

前 言

自乾隆元年(1736)始,至道光十四年(1834,谱主王引之卒年)的百年间,军政国事昌盛,经济文化繁荣,不但是有清一代最值得炫耀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另一残酷史实:因长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面临世界风云变幻却一无所知,强大的清帝国终于自道光朝晚期开始,受辱于殖民势力,痛遭沉重打击,一落千丈,跌入低谷。再回溯到自明朝崇祯八年(1635)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的百年岁月,那又是一个中华民族从明朝末年空谈误国的沉痛打击中,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在双重痛苦煎熬中的既是明朝遗民,又是新朝叛逆者、改革者,他们不但为清朝的鼎盛期奠定了基本国策和全民族的意识标准,同时也开创了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治学途径和治国良策。

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末遗民,义不容辞地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联络志士,武装抗衡;另一方面则反省前朝蹈虚凿空的陋儒恶习,倡导学用结合,以践履实行为准则,强调实学,以经世为目的。虽然反清的行动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复明的期望渐渐沉沦而消失,但他们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却蔓延开来,深入到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下层求知者的行列中,影从和私淑者代不乏人,至乾嘉时期登峰造极,形成空前绝后的一大学术流派——乾嘉学派。说其“空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如此涵括吴、皖、扬、常江南四派及北方一派如此阵容庞大,且跨越时空如此久远者。说其“绝后”,实乃道光、咸丰、同